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明清史研究文集

西南大学期刊社 /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项资助成果 ——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明清史研究文集

西南大学期刊社 / 编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张颖超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史研究文集 / 西南大学期刊社编.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2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1-9134-6

I. ①明… II. ①西… III. ①中国历史—明清时代—
文集 IV. ①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0646 号

明清史研究文集

MINGQINGSHI YANJIU WENJI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项资助成果

西南大学期刊社 编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张颖超

责任编辑：赖晓玥

封面设计：王玉菊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1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5mm×235mm

印 张：22.5

字 数：39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9134-6

定 价：70.00 元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任:靳玉乐

副主任:李远毅 黄大宏 欧 宾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列)

毛兴贵 文 娟 刘荣军 李远毅 张颖超 欧 宾

高阿蕊 唐益明 黄大宏 曹 莉 崔玉洁 蒋登科

韩云波 靳玉乐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自然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 明

副主任:李远毅 黄大宏 欧 宾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列)

文 娟 包 颖 汤兴华 汤振金 孙 凡

李 明 李远毅 张 沁 陈绍兰 周仁惠

欧 宾 胡 杨 夏 娟 唐益明 黄大宏

崔玉洁 覃吉康 廖 坤 潘春燕

分册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文集》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毛兴贵 高阿蕊

《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韩云波

《明清史研究文集》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张颖超

《教育学研究文集》 主 编 李远毅

执行主编 曹 莉

《心理学研究文集》 主 编 李远毅

执行主编 曹 莉

《“领跑者5000”论文集》 主 编 欧 宾

本丛书是《西南大学学报》改版10年来，首次精选所刊发的各学科领域代表性论文编纂而成的系列文集，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办刊的成绩，并作为创刊60周年的纪念。

《西南大学学报》的前身是创自1957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西南农学院学报》，两刊都属1949年以来，创办时间最悠久的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1985年以后，随着两校办学的发展，先后分别改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西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至2005年两校合并组建西南大学，各自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2005年，世所熟知的“西师”“西农”两校，皆源出于1906年创建之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在各经百年发展后，又重新融合，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在2016年迎来合并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这12年间，随着西南大学成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并获准为“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原来的两刊也变更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秉承“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的校训，以新的面貌继续发挥着

沟通西南大学与学界、业界的纽带与桥梁的作用。

两刊创立伊始，就以繁荣学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宗旨。几代编辑同仁数十年如一日，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孜孜矻矻，甘作嫁衣，以广交天下英才，提高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准，扩大期刊学术影响力，使之成为学界重要成果的主要发表平台为追求。以今视往，《西南大学学报》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导向作用、优秀学术成果的推广作用、对外交流中的形象作用、对学术人才的扶持作用、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水平的窗口作用日臻显著，也锻炼了一支业务精湛的学术型编辑队伍，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可。《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第一届重庆出版政府奖”，获得“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称号，作为重庆市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的代表性刊物，在全国同类学术期刊中位居前列。《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近年来四次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多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及“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称号。两刊多次被重庆市评为一级期刊，2012年以来各年度均获得重庆市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总结和展示两刊60年来的办刊成绩以及组建后的西南大学办学成就，是我们编集本丛书的源起和初衷。

在2017年6月动议之时，本丛书只是基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多年设立的几个主要栏目，精选历年高转载、高被引论文，分别编集系列专题论文集，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文集》《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教育学研究文集》《心理学研究文集》和《明清史研究文集》5种，拟入选论文100余篇，暂定名为“《西

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建设丛书”,共一百多万字,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社科版论文集的编纂过程中,我们一直希望涵容自然科学版刊发的高质量论文,使本丛书真正成为《西南大学学报》创刊60周年暨改版10周年的纪念文集。但因编选体例难于确定,这一想法一直悬而未决。10月底,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知自然科学版第3次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即“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项目来源期刊,又新入选3篇“‘领跑者5000’(F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即各学科年度所发表论文中的前1%高被引论文)。至此,共有30多篇论文入选“领跑者5000”项目,既体现了自然科学版的学术影响力,也落实了文集编选体例,使《“领跑者5000”论文集》与前5种社科文集一起,共同构成《〈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的完整面貌。

本丛书的编纂,固然是基于本刊同仁数十年来励志耕耘的心血,也有赖于西南大学领导、各院系及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学界大批专家学者的信任,以及业界先进的指引,我们对此深怀感激。这次旧文新刊,就是一次总结性的汇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希望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导,使我们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西南大学期刊社

2017年12月

- 001 上 编 明清政治研究
- 003 明代的密疏:下情上达的一种特殊方式
——以题本、奏本为参照 / 王 剑
- 014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 孔定芳
- 031 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
——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 / 彭 勇
- 043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 乘 凡
- 056 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 陈宝良
- 070 从关羽庙宇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北移 / 包诗卿
- 082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 高寿仙
- 100 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 吴 琦,马 俊
- 115 关于燕王朱棣的两篇敕书造假案献疑 / 南炳文
- 128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 田 涠
- 144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 柳岳武
- 160 清代厅城的类型与特点研究 / 马天卓
- 172 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术文化精神 / 张明富
- 184 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 / 吴才茂
- 201 晚清马政的整顿与变革浅探 / 陈振国

213 下 编 明清经济与社会研究

- 215 社会流动与晚明信息场的发达 / 刘中兴
- 227 明清“收养孤老”律例与社会稳定 / 柏 桦
- 243 论清代“盐法”律例实施中贫民的困境 / 任晓兰
- 252 昂贵的京控
——嘉庆朝徐姓自戕案分析 / 石 怡, 罗冬阳
- 268 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
——以明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 / 王日根
- 287 明清之际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 / 刘志刚
- 298 从常熟均赋到昭文民变
——清道光晚期江南社会危机透视 / 郭燕红
- 313 清朝旗民婚姻政策考论 / 陈 力
- 327 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 / 范 金 民

348 后 记

上
编

—
明清政治研究
—



明代的密疏：下情上达的一种特殊方式

——以题本、奏本为参照

王 剑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在明代，下情上达的正常渠道主要有十种，即题、奏启、表笺、讲章、书状、文册、揭帖、会议、露布、译等。而密疏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密疏有着奏报时效性强、奏报内容相对真实、皇帝更加重视并能及时批答等特点，就其本质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下情上达的官文书。

在明代，下情上达的正常渠道主要有十种，即题、奏启、表笺、讲章、书状、文册、揭帖、会议、露布、译等^[1]。这十种文体都各有独特之处，既有固定的文档格式和内容范围，又有相应的上呈渠道和处理程式。而密疏作为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内容上，它可以是包括题、奏启、表笺等形式的上行官文书的内容；在文档格式上，它不像其他上行官文书严格受文档格式的限制；在密疏的上呈上，它是直达御前开拆；从内容的保密性上说，密疏也比其他上行官文书的保密性要强得多。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除以上差异外，密疏还有正常题奏本所没有的长处。

一、密疏奏报的时效性

正常题奏本的书写，要严格遵循格式，在转呈时也会因经手部门较多，且受到各衙门正常作息时间的限制，往往会造成政情奏报的不及时或延误。而

密疏则不同,对于紧急事件的奏报,密疏奏报的时效性比正常题奏本要及时得多。密疏的奏报,明初时曾规定要“不限旦晚”或“不时以闻”。即便是密疏按正常方式奏至通政司,通政司当值人员亦可持书有“奏事使”三字的红牌,直入内府奏报,“各门守卫等官不敢阻挡”,从而保证密疏奏报的及时性。而自会极门转呈者更是如此,会极门内的当值内使遇密疏奏报,更须即刻呈入。至于从宫门递入内廷的密疏,宣德年间,宣宗听说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夜递至北中门,守卫不肯转达,即刻下诏锦衣卫官:“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2]卷9}自此,从宫门递入内廷的密疏的时效性也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在明代,用密疏及时奏报重大突发事件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英宗天顺初年,曹吉祥、曹钦在北京策谋反叛,其部下都指挥马亮告变于恭顺侯吴瑾,吴瑾再告怀宁侯孙镗,吴瑾、孙镗等遂草拟密疏从长安右门门隙将密疏递入内廷示警,致使英宗“急縶(曹)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门闭弗启”,从而为及时粉碎叛乱做好准备。^{[3]卷304,《曹吉祥传》}同样在曹吉祥之乱时,内阁大学士李贤亦在紧急关头上密疏奏请擒贼。^{[3]卷167,《李贤传》}如果没有孙镗、李贤等人及时密疏奏报,曹吉祥之乱可能产生的影响亦未可知,很显然,此时密疏奏报的时效性是正常的题奏本不能比拟的。

再如,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当时有武弁王曰乾向神宗奏报:“有女人大姐嫁与皇贵妃宫中内相姜丽山(《明史》作严山),时在阜城门外庄上歃血为盟,必报郑贵妃厚恩,要结心腹好汉,共图大事,将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王,必大升赏,富贵非小;立有妖书一册,会填姓名,令宗舜男、赵思圣(《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赵圣)收掌。二月初,宗舜、孔学等设席请妖人王三诏等至家,书写圣母同皇上圣号、皇太子生辰,在学后花园内摆设香纸数分,又用黑瓷射魂瓶一个,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将新铁针四十九只钉在纸人目上,七日方焚化,收坛,相聚约定,只在圣节前后下手等云。”此事非同寻常,事由很像早年的妖书案和续妖书案,且此次妖事活动不仅仅指向皇太子,而且事涉圣母李太后和神宗自己,最严重的是要将神宗一并弑毒,所以“疏进,神庙愤怒不堪,绕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即将开始,可能要有很多人受到牵连。此时首辅叶向高立即给神宗进密疏,提出自己

对处理此事的建议：“往年妖书出于匿名，无可究治，故难于处置，今告者与被告者人皆现在，一下法司鞫审，其情立见，皇上但静以处之，不必张惶，一或张惶，则中外纷扰，其祸有不可言者矣。”但叶向高在此通密疏呈入以后仍觉得事关重大，因而又密疏奏请：“不如姑且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当于别疏批出，或另传圣谕，中有干碍事情，不必尽露，要以正国法，尊国体，两尽而无伤，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国吉期，以息群喙，则天下恬然无事矣。”叶向高的密疏再次呈入，“漏已下四鼓，神庙尚未就寝”，神宗看了叶向高的密疏后“怒始霁，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第二天神宗按叶向高密疏的奏请，将王曰乾置于法司并毙之于狱，并谕礼部，择福王之国吉期以闻^{[4]卷上}。从而解决了这场政治危机。应该说，叶向高的密疏奏闻十分及时，否则盛怒的神宗很可能将事态迅速扩大，而将遭到危害的也必将是郑贵妃一党，这是神宗皇帝和叶向高都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时效性，恐怕是正常的章奏所达不到的。

二、密疏奏报内容的真实性

强调密疏奏报内容的真实性，并不是说朝臣用正常的题奏本向皇帝奏报事务就不真实可靠，也不等于说密疏奏报的内容就绝对都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性，只是相对而言。

奏报者有时为了某种利益故意向皇帝隐瞒事实真相，而此时密疏的奏报才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如，嘉靖六年六月，霍韬、桂萼两人极力举荐王琼事。王琼，成化二十年进士，以敏练著称，历户部郎中、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十年改兵部尚书。正德间，“厚事钱宁、江彬等”，因所行之事“多取中旨，不关内阁”，与内阁首辅杨廷和有隙。嘉靖初年，“言官交劾琼，系都察院狱。琼力讦廷和，帝愈不直琼，下廷臣杂议。坐交结近侍律论死，命戍庄浪。琼复诉年老，改戍绥德”^{[3]卷198，《王琼传》}。霍、桂二人举荐王琼最早于嘉靖元年，当时张璁、霍韬、桂萼等用事，因王琼与杨廷和有仇，欲通过力荐王琼来和杨廷和抗衡，结果没有成功。六年三月，边地有警，宣府失事，桂萼因受王琼巨贿又极力举荐王琼，而给事中郑自璧“率同官与御史谭缵等言琼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请并论”^{[3]卷208，《郑自璧传》}。可见桂萼、霍韬等举荐王琼大有隐情。而杨一清洞察其奸，上密疏说明事情真相：

臣与王琼素相知厚。臣在吏部，琼在户部尚书，交处数年。其才识之优，识见之敏，人多不及。但心险难测，性(性)贪有疾，始则厚结钱宁倚为心腹贿赂交通，三边将帅，尽出二门。后又交结江彬，宁败而无祸者，江彬为之援也。皇上嗣位之初，科、道交章效(劾)其罪恶，奉旨拿问。法司议拟，比依交结朋党，紊乱朝政律处斩。节该奉钦依：“烧死，发边远充军。”数年以来，无人敢议其可起用者，至今年六月间，桂萼始荐之。……今因萼、韬论荐，拟复尚书致仕，以俟圣明裁择。臣等于此，大有不得已者，而一寸之忠，终不能自白于君父之前，其罪大矣。……若违众论之同情，拂天下之公议，而徒徇乎一二人所见之偏，万一得志柄用，恣其机巧，以坏天下之事，彼固不足惜，而荐之者亦岂能逃乎其责哉？^{[5]卷5政谕上，《论王琼可用否奏对》}

当时杨一清与桂萼、霍韬已产生了矛盾，其中不排除杨一清借机参劾桂、霍二人的可能，但杨一清的密疏所反映的桂萼私昵王琼，以及王琼在正德年间的种种不法也确是事实。

再如，嘉靖三十六年夏，辽东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死伤军民无算，下半年水退后又遭大旱，三十七年再遭大水，整个辽东陷入了绝境。当时辽东地方上下请援，但此时朝中正值严嵩当权，对辽东地面救助不力，致使辽东全面处于饥馁之中。直到四十一年四月，世宗皇帝方初略得知辽东危困，但仍不知是何原因导致辽东疲困，因而密谕垂问徐阶：“辽东久不受困，近何疲乏之？”辽东大水已过五年，形成大饥荒已有四年，世宗竟然不知。世宗长期在西苑修道斋醮，除了朝臣的题本奏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正常途径可以了解下情，若朝臣所奏内容不实，世宗自然很难得知事情的原委与实际情况。此时徐阶的密疏上奏，为世宗解开了辽东受困的疑惑：“辽东旧称强镇，自三十七年大水之后，边墙倒塌，军民损伤过半，其时赖有总兵杨照，谋勇廉洁，人甚戴之，虏亦畏之，稍能支撑一二。后因照与管粮郎中等官节次讦奏革任。不惟朝廷不得照之用，而继照者，以照为戒，惟务苟全，遂致边务日费日坏，今事势危迫，有不但如吉澄疏中所云者，此须乞皇上独断。”^{[6]卷2，《答辽东宣大边事谕》}假如没有徐阶的密疏奏闻，可能世宗永远不会知道辽东地面的军民百姓是如何的艰苦，也就不会有后来对辽东的进一步救助。

三、皇帝对密疏更加重视

密疏上呈的及时性、奏报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密疏的保密性等特征,使得密疏成为深居内廷的君王了解下情的重要渠道,自然其重要性会得到皇帝的重视。因而皇帝对密疏的高度重视,是其他正常题奏本所不能比拟的。

从明初朱元璋时代起,明代的每一位皇帝都十分重视密疏的作用。应该说,在明英宗正统以前,皇帝的勤政、君臣间议政方式的多样性,使得下情上达基本上还是畅通的,即便如此,明前期诸帝,或是制定相关规定保证密疏能顺利直达御前,或是用不同方式鼓励朝臣密疏言事,或是给朝臣赐印允密疏言事,特别是明代中前期,历朝对密疏言事制度化的初步建设,使得密疏言事基本上做到了有章可循。自英宗正统以后,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密疏的地位更加重要,其作用也更加引起诸皇帝的重视。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自正统以后,明代前期的各种良好的议政传统,如“君臣同游”“赐宴”“留宿”“入直奏对”等,大多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皇帝普遍地厌政、怠政,甚至是荒政,内阁政治的发展,内阁与司礼监的紧密合作,使得明代的政治在没有皇帝严密控制的情况下,照常运行。因而,明人言“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焉,而政事大权俱归于左右。夫在帝左右者,纵皆谨厚之人,而身在大内,天下之事安得尽知,蒙蔽之患由之以兴,而威福不能不下移矣”^{[5]卷6政谕中,《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按此说法,蒙蔽之患与威福下移,皆源于皇帝不能及时了解下情,但事实上从宪宗以后,在明代除极个别时期,并没有出现“蒙蔽之患”与“威福下移”的局面。个中缘由,恐怕与皇帝可以通过朝臣的密疏来增加外来信息分不开。

孝宗朝最称宫府一体,且孝宗视朝之勤及对朝臣章奏的及时批答,是明代中期最为突出的,即便如此,孝宗还是希望刘大夏能给他进密疏。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也是“阁臣密奏,与主上密谕,上下传达”^{[7]补遗卷2,《内阁密封之体》},可见,孝宗对密疏的使用是十分重视的。至于世宗和神宗就更突出了,沈德符称这个时期的密疏的作用为:“不知转移圣意,全恃此一线,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7]卷7,《内阁密揭》}沈德符所说的转移圣意全恃密疏,“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世宗和神宗都是二十几年不上朝,特别是神宗对朝臣正常章奏的批答,动辄留中。应该说,下情上达的正常渠道并不是十分畅通,